

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

羅曉南／著

李英明、張亞中／主編



20002

港台书局

【亞太研究系列】

當代中國文化轉型與認同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ty



羅曉南 著

李英明、張亞中 主編

00819437

主 編／張亞中、李英明
著 者／羅曉南
出 版／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林智堅
副總編輯／葉忠賢
責任編輯／賴筱彌
執行編輯／韓桂蘭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677 號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溪州街 67 號地下樓
電 話／(02)366-0309 366-0313
傳 真／(02)366-0310
印 刷／偉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初版一刷／1997 年 11 月
I S B N ／ 957-8637-49-7
定 價／新台幣 250 元整

南區總經銷／昱泓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嘉義市通化四街 45 號
電 話／(05)231-1949 231-1572
傳 真／(05)231-100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E-mail:ufx0309@ms13.hinet.net

* * * *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 * * *

「亞太研究系列」總序

「二十一世紀是亞太的世紀」，這句話不斷地被談起，代表著自信與驕傲。但是亞太地區絕非如此單純，未來發展亦非一定樂觀，它的複雜早已以不同型態呈現在世人面前，在開啓新世紀的同時，以沉靜的心境，深刻地瞭解與解決亞太區域的問題，或許才是我們在面對亞太的態度。

亞太地區有著不同內涵的多元文化色彩，在這塊土地上有著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有傳承西方文明的美加澳紐、代表儒教文明的中國、混合儒佛神教文明的日本、以及混雜著不同文明的東南亞後殖民地區。文化的衝突不止在區域間時有發生，在各國內部亦時有所聞，並以不同的面貌形式展現它們的差異。

美加澳紐的移民問題挑戰著西方主流社會的民族融合概念，它反證著多元化融合的觀念只是適用於西方的同文明信仰者，先主後從，主尊客卑，白優黃劣仍是少數西方人面對東方移民時無法拋棄的心理情結。西藏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內部民族或政經社會議題，早已成為國際上的重要課題與工具。兩岸中國人與日韓三方面的恩怨情仇，濃得讓人難以下嚥，引發的社會政治爭議難以讓社會平靜。馬來西亞的第二代、第三代、或已經是第好幾代的華

人，仍有著永遠無法在以回教為國教的祖國裏當家作主的無奈。這些不同的民族與族群問題，讓亞太地區的社會潛伏著不安的危機。

亞太地區的政治型態也是多重的。有先進的民主國家；也有的趕上了二十世紀末民主浪潮，從威權走向民主，但其中有的仍無法擺脫派系金權，有的仍舊依靠地域族群的支持來建構其政權的合法性，它們有著美麗的民主外衣，但骨子裡還是甩不掉威權時期的心態與習性；有的標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幟，走的卻是資本主義的道路；有的高喊民主主義的口號，但行的卻是軍隊操控選舉與內閣；有的自我認定是政黨政治，但在別人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一黨專政，這些就是亞太地區的政治形態寫照。不同地區的人民有著不同的希望與訴求，菁英份子在政治格局下的理念與目標也有著顯著的差異，命運也有不同，但整個政治社會仍在不停的轉動，都在向「人民為主」的方向轉，但是轉的路徑不同、速度有快有慢。

亞太地區各次級區域有著潛在的軍事衝突，包括位於東北亞的朝鮮半島危機；東亞中介區域的台海兩岸軍事衝突；以及東南亞的南海領土主權爭議等等。這些潛在的軍事衝突，背後有著強權大國的利益糾結，涉及到複雜的歷史因素與不同的國家利害關係，不是任何一個亞太地區的安全機制或強權大國可以同時處理或單獨解決。在亞太區域內有著「亞太主義」與「亞洲主義」的爭辯，也有著美國是否有世界霸權心態、日本軍國主義會否復活、中國威脅論會否存在的懷疑與爭吵。美國、日本、中國大陸、東

協的四極體系已在亞太區域形成，合縱連橫自然在所難免，亞太地區的國際政治與安全格局也不會是容易平靜的。

相對於亞太的政治發展與安全問題，經濟成果是亞太地區最足以自豪的。這塊區域裡有二十世紀最大的經濟強權，有二次大戰後快速崛起的日本，有七〇年代興起的亞洲四小龍，八〇年代積極推動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九〇年代引人矚目的新四小龍。這個地區有多層次分工的基礎，有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有高度自由化的自由經濟，有高儲蓄及投資率的環境，以及外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使得世界的經濟重心確有逐漸移至此一地區的趨勢。有人認為在未來世界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中，亞太地區將擔任實質帶領全球經濟步入二十一世紀的重責大任，但也有人認為亞洲的經濟奇蹟是虛幻的，缺乏高科技的研究實力、社會貧富的懸殊差距、環境的污染破壞、政府的低效能等等，都將使得亞洲的經濟發展有著相當的隱憂。不論如何，亞太區域未來經濟的發展將牽動整個世界，影響人類的貧富，值得我們深刻的關注。

在亞太這個區域裡，經濟上有著統合的潮流，但在政治上也有著分離的趨勢。亞太經合會議(APEC)使得亞太地區各個國家的經濟依存關係日趨密切，太平洋盆地經濟會議(PBEC)，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也不停創造這一地區內產、官、學界共同推動經濟自由與整合的機會。但是台灣的台獨運動、印尼與東帝汶的關係、菲律賓與摩洛分離主義……，使得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安全都受到影

響，也使得經濟與政治何者為重，群體與個體何者優先的思辨，仍是亞太地區的重要課題。

亞太地區在國際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台灣處於亞太地區的中心，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方面，均與亞太地區有密切的互動。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強與美日政經關係、尋求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緩和、積極推動南向政策、鼓吹建立亞太地區安全體系，以及擬將台灣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等等，無一不與亞太地區的全局架構有密切關係。在現實中，台灣在面對亞太地區時也有本身取捨的困境，如何在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中找到平衡點，如何在台灣優先與利益均霑間找到交集，如何全面顧及南向政策與西向政策，如何找尋與界定台灣在亞太區域中的合理角色與定位，也是值得共同思考的議題。

「亞太研究系列」的出版，表徵出與海內外學者專家共同對上述各類議題探討研究的期盼，也希望由於「亞太研究系列」的廣行，使得國人更加深對亞太地區的關切與瞭解。本叢書由李英明教授與本人共同擔任主編，我們亦將極盡全力，為各位讀者推薦有深度、有份量、值得共同思考、觀察與研究的著作。當然也更希望您們的共同參與和指教。

張亞中

自序

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文化一向是我關注的論題，為了深化自己對此論題的理解並充實相關的知識，筆者又著手了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研究。然則，這些背景並沒有使筆者興起探討當代中國大陸文化變遷的念頭。一方面，這是因為筆者自認對於中共文藝界之理論及動態了解甚膚淺，不敢輕言嘗試；另一方面，則因為當時尚不曉得可以別闢蹊徑，走其他路子來切入同一主題。一直要到五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裡，筆者才拋開了過去種種的顧忌，大膽著手了目前這項研究計畫。

1992年夏，筆者因父親年事已高且體弱多病，為了便於就近照顧，故而離開了執教十餘年的東海大學，北上世新學院任職。在新聞系授課期間，系上基於我的「新馬」背景，邀我開設「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課程。為了準備這一新課程，筆者著實閱讀了不少相關的文獻，卻也無意間給我多年著力之中國大陸研究，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透過『文化研究』的視野來觀照中國大陸的文化轉型，或許會另有一番景緻吧！」這樣的想法開始

盤旋腦際。儘管如此，我此時關切的重點仍然擺在（法蘭克福學派）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幾本新論著上。一直要到次年（1993年）的一次研討會上，向幾位中共研究的先進討教後，才確定了此一新的研究方向。當時他們提醒我，目前在海外「中國學」（Sinology）界，文化研究的取徑雖方興未艾，但國內尚沒有一本這方面的論著，筆者既然教授「文化研究」課程，又具有「中國大陸研究」專業背景，自應當仁不讓，勉力而為。經此一番開導與鼓勵，筆者遂不再猶豫，當即研擬了一份以後長達四年餘的研究寫作計畫，這即是本書的緣起。

在本書寫作期間，筆者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即是資料蒐集上的困難。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大陸資料取得仍然不易，而且還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一向伺候他的老管家也不幸患上老人痴呆症，亦亟需人照料，在現實生活中的重重壓力下，筆者分身乏術，實無足夠餘力再去為資料奔波。幸好有在政大東亞所博士班就讀的溫治溢學弟肯仗義相助，才使得筆者的難題迎刃而解。治溢不僅幫我從國內外匯集相關文獻，乃至打字繕稿，而且還屢次參與了筆者研究論題的問辯與詰難，給我提供了許多有建設性的意見，因而本書之出版，首先要感謝的就是他。

本書共分五章及一篇導論，事實上是由五篇獨立的論文所組成。由於是有計畫的寫作，因而在論題上頗具貫連性（詳導論）。其中，第四章〈流行文化與中國式社會主義〉完稿於1994年暑假，是最先完成的一篇，但遲到去年（1996年）一月才在政治大學《東亞季刊》（27卷第

3期）上發表，並於今年得到國科會論文研究獎助(86-2813-C-128-001-003)。此後依次完成的是：第三章〈轉型期間知識份子之自我意識與文化認同〉（1995年7月），第二章〈文化轉變、關係本位與想像共同體之重構〉（1996年4月），第一章〈從毛到鄧——中共意識形態轉變與經濟改革〉（1996年9月），第五章〈中國文化往何處去？——改革開放中的民族主義思潮〉（1997年5月）。而第二章和第五章亦已先後在《東亞季刊》發表（分別是28卷第1期與第3期，1997年），但在本書集結時，其內容都有所增修。

本書之得以成形，還要感謝我的幾位好友：蔡英文、黃瑞祺、閻嘯平、徐振國、江宜樺等教授，在這幾年寫作期間，他們或者提供資訊，或者參與討論，或者幫忙看初稿並給予評論，這對個人言真是受益匪淺。也感謝揚智文化公司願意出版本書，特別是韓桂蘭小姐的辛苦校對與排版設計。

最後，謹以此書紀念先父及照顧家人四十餘年的老管家，兩位老人家在去年5、6月間先後過世。這期間，筆者知交東海大學哲學系蔣年豐教授，也因久病纏身，為免拖累學生及家人而懸樑自盡。年豐死時，我正忙於料理家人後事，未有時間為文紀悼而引為憾事，由於他一向關心我的這項研究，也希望藉著這本書的出版，能多少表達我對他的哀思。

不斷面對家人摯友之病老死痛，以及在最後時刻和他們之溫馨相處，這使得筆者在寫這本書時，不免深深地感

染了一份對人生的無奈但又悲憫之情，或許正是由於這種無奈與悲憫，才給本書的文化批判，提供了最基本的動力吧！

羅曉南

目 錄

「亞太研究系列」總序	1
自序	1
導論	1
<hr/>	
第一章：從毛到鄧：中國社會形態轉變與經濟改革	11
<hr/>	
第一節 文化轉變與社會變遷	11
第二節 毛澤東思想與反現代主義	14
第三節 毛思想、現代主義與生產力發展	24
第四節 有中國特色的「後社會主義」？	31
第五節 「經改」成功的初始文化條件	37
<hr/>	
第二章：文化轉變、關係本位與想像共同體之重構	49
<hr/>	
第一節 文化轉變的一般趨勢	49
第二節 農村文化轉型中的變與常	57

第三節	城市文化轉型中的變與常	70
第四節	文化轉變的意義	83

第三章：轉型期間知識份子之自我意識與文化認同 97

第一節	改革開放過程中知識份子與西方文化之互動	99
第二節	文化傳承與新時期知識份子之自我認同	106
第三節	三種知識份子與文化認同之重構	117

第四章：流行文化與中國式社會主義 129

第一節	流行文化之復甦與中共當局的關注	129
第二節	「文化衫現象」與「毛澤東文化熱」	135
第三節	「文化(藝)為政治服務」、「群眾文化」、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論述	143
第四節	「文化市場」論述與「消費文化」論述	155

第五節	流行文化、中國式社會主義 意識形態與文化認同	165
-----	---------------------------	-----

第五章：中國文化往何處去—改革開放中的民族主義思潮 179

第一節	九〇年代文化轉型中的「本土化」現象	179
第二節	「中華民族復興」抑「民族沙文主義」？	186
第三節	兩種民族主義—李大釗、毛澤東 VS.孫中山	197
第四節	文化認同、民族主義與文明作風	221
第五節	餘論	228
參考書目		245
索引		261

導論

不同於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共黨的革命運動同時還是一種價值取向的運動(value-oriented movement)，要和舊社會的價值體系作徹底的決裂，並因而無可避免的會憾動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也因此，當一九四九年，中共在戰爭中雖然已取得全面的勝利並掌控了國家機器，但對於其領導階層而言，革命尚未成功，仍有眾多的社會改造工作亟待努力。於是乎在「黨」的領導下，一波一波的群眾運動就如火如荼的展開了，這包括「土改運動」、對知識份子之「思想改造運動」、對幹部之「整風運動」、「反右運動」、文藝界對「武訓傳」、俞平伯、胡風等之「文化批判」運動、「三面紅旗」運動、「文化大革命」及其相關的「批林批孔」運動和「破舊立新」之紅衛兵運動等。

在「解放」的前卅年，這種類型的社會運動幾乎無年無之。雖然它們也都具有其他的任務及目標，譬如：改革幹部隊伍、建構集體經濟體制、調整管理方式，乃至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等，但無論如何，這些運動都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到人們日常生活世界之價值觀的變革及改造。然則，令人訝異的是，儘管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努力，大部分的人似乎也只是在形式上改變了對事物的看法，只是機會主義的採行了革命的論述，以取代革命前的「封建」論述或「資產階級」論述；在深層結構方面，仍然根深柢固的是舊社會的價值，而且一當社會運動急遽減少或停止，當局的此種控制一旦放鬆後，所有舊社會的東西（乃至其「整體生活方式」），似乎一夜之間又都回朝了。

而更令人訝異的是，卅年來中共當局努力設法變革而終未能成就的改造群眾價值觀的工作，卻在一九七八年後一場以「經濟建設」為名的改革進程中，不期然的達成了。儘管此次文化價值之轉變，其方向未盡符合中共當局原初的設想，乃至與之相抵觸，但其變革之深，幅度之大，甚至牽動了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文化認同，就此而言，吾人實不得不予以正視，這也正是本書之所以選定此一過程作為研究主題的主要緣故。

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論中共意識形態之鬆綁與其經濟改革之關係，第二章則就此次文化轉變的總趨勢作探討，第三章論知識份子精英層文化價值觀之變革及認同問題，第四章論流行大眾文化及其蘊藏之意識形態功能，第五章則就九〇年代文化思潮之新轉折——民族主義作省

思。

在第一章中，筆者著重指出了：在這一波價值觀念的劇變過程中，文化並不只是中共「經改」的依變數，它同時也「能動的」作用於經濟的變遷，故二者的關聯是辨證互動的。文化的這種「先導作用」，首先表現在權威當局統制之意識形態的鬆綁方面，具體言之，即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轉折。

毛思想，一般言之，多強調其「上層建築決定論」、「生產關係決定論」或「政治掛帥」等特徵。然則，這種論點容易忽略毛本人並不忽視生產力的發展，與其他重視生產力發展者相比較，其差異僅在於他對「如何發展生產力」有不同之主張，也就是說，毛對「生產力至上」取向之資本主義現代性是有批判的。儘管如此，這並不是說毛思想應被定位為一種純粹的「反現代主義」思想——反「資本主義現代性」，但不反現代性本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定位，一方面仍可能將毛之「抓革命，促生產」中所含攝的實用主義面向(一種「道德—政治」層面的工具理性化)加以化約；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會一筆抹煞毛思想中某些潛在的「現代主義的要素」，這些要素及其實踐，依據今日學者的看法，形構了中共當前「經改」成功的「初始條件」。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東歐之「經改」正因為缺乏這種初始的「繼承結構」而遭受挫折。(註)

就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言，它的主要特徵則在於「摸著石頭過河」這種漸進主義的改革路線，